

# 史記札記

現代教育出版社

## 前 言

社会在一天天地发展，可是人们总放不下忘记过去，因为这是一段离去的历史。我反复强调：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如果没有历史感是浅薄的。因为历史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过去，而是预示着辉煌的未来。

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，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，有着从未间断的绵延历程。中国的文明时代至少也有 5000 年以上，在传承这厚重的历史的过程中，历史学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其中以司马迁最为杰出。

说到司马迁，人们免不了要为他不公正的遭遇大鸣不平，两千多年来大抵如此。其实，司马迁本人也是深有同感，所以他积极倡导德主刑辅，坚决反对人制下的“法制”。汉武帝初年，政治清平，是黄老学派的天下。黄老讲究人人和谐、人地和谐，要求高收效慢，历经七十年才有了真正的新气象，很不容易。

记得我们从小开始，家长、老师就教育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时至今日，我们还会常常看见有人而且是不少人闯红灯。但是，如果有一个警察，马上就没有人敢闯红灯了。由此可见教育与法制之间的差距有多么的大。所以，司马迁认为德政收功慢，却很彻底；法制见效快，但不治本。两者之间是在彼不在此的本末关系。

德是中国古代衡量个人、社会的重要标准，从为人处世的角度讲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一般老百姓，德都是人生的第一准则，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所以，在司马迁的笔下，黄帝、大禹



都是以德治国的典范，并且不惜笔墨予以表彰。

余读《史记》已有三十余年。自20世纪80年代初跟随张大可老师学习《史记》，不觉也有二十八年了。几十年来之所以难以割舍《史记》，一是《史记》之博大精深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；二是司马迁的人格魅力非常人所比。

今《史记札记》一书正是多年来学习的心得体会之一，系每每感悟之际辄而记之。本书为第一册，主要内容是：论司马迁好“数”；讲《史记》“五体”；究《五帝本纪》黄帝之是是非非；穷《夏本纪》大禹治水中的诸多问题。

所谓好“数”，但不是研究数学，而是搞数字游戏。中国人好数字、喜欢数字、更迷信数字，相信数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因素，古今亦然。从十天干、十二地支，到十大名妓、十二金钗头，无一不是数字游戏。

2 司马迁是人，上承黄老又处于董学，故不能例其之外。所书“五体”、“本纪十二”、“表十”、“书八”、“世家三十”、“列传七十”凡百三十篇。“五体”与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行有关，所谓“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四时、五行，故长于变”。这个“变”，司马迁指的是自然规律的有序变化，而“阴阳四时、五行”只是变化中的有机组合，所谓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者即是。

“本纪十二”，十二是天之大数，一年十二个月，是与天文历法相关联。他在《自序》中说：“夫阴阳四时，八位、十二度，二十四节气各有教令……”。十二度，是指一年的十二个月。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，古代中国最发达的就是天文学。《史记》一书精妙之处惟在天文，上下3000年，集大成于一书，可圈可点。

“表十”之“十”，亦与天文历法有关，是古老的“十天记日法”的反映。古人最初记时仅限于三，到后来才发展到十，他们

借助自己的十指，故定十个太阳日，以确定时间段，也叫做“十天记日法”。

“书八”，比较复杂，但其核心是源于《易》中的八卦哲学。八卦者：乾、坤、震、艮、离、坎、兑、巽，对应为：天、地、雷、山、水、火、泽、风。是为八大类象征，亦可以囊括古代所认为的一切，包括天文学在内。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形式，八卦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，同时也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。司马迁用数“八”来专记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朝章国典、文化大事，并序列全书五体之中，正是在八卦哲学影响下以“八”为基数的序列组合构架，重要之处如同房屋之顶梁柱和人之脊梁骨。

“世家三十”，《自序》称：“二十八宿环北展，三十辐共一毂，运行无穷，辅拂股肱之臣配焉，忠信行道，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”。有三层意思：一是指一月三十天运行无穷，周而复始，生生无穷。三是以忠信良臣为星，环绕中宫；二是借老子之言，取车辐之数，喻向心作用。如河南洛阳出土的东周“天子驾六”中的车轮就是三十根辐条，1974年在陕西临潼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中的战车遗址，其车轮就是三十根辐条，后来1980年再次发现的一、二号铜车马的轮子，同样是三十根辐条。

“列传七十”，是在古代七十二候的物候历之“七十二”之基数上简括而成。司马氏世居天官，作为家学，司马迁尤其精通当时的所有历法，对物候也了如指掌，他曾与遂壻、邓平、落下闳等天文学家一道制太初历，所以司马迁作“七十”列传，取历法之数是不言而喻。

百三十篇，亦古代十三月历法的表现，今云南小凉山的宁蒗彝族自治县还残存着一个月二十八天，一年十三个月共三百六十四天的历法，是为见证。

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，作为信史，虽然说是言而有征，但仍然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。所以，疑古派不予承认。《史记札记》



一书从：维昔黄帝，法天则地；黄色之帝；黄帝生地；黄帝姬姓；轩辕之都；轩辕之时，神农氏世衰；风后、力牧、常先、大鸿以治民；嫫祖正妃；三鼎与九鼎；桥山与缙云；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迄十一个方面，以文献为基础，以考古资料为佐证，并且结合多年来实地考察所得，进行探讨，多有新意，值得一读。

大禹治水，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《史记·夏本纪》记载：“维禹之功，九州攸同，光唐虞际，德流苗裔；夏桀淫骄，乃放鸣条。”夏朝是我国第一王朝，《夏本纪》正是记载夏朝历史的珍贵文献，也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部夏代史。为了记叙大禹治水一统九州的伟大业绩，司马迁从文献梳理到实地考察做了全方位的努力，付出了极大的心血，其中不少已经被出土文物所证实。特别是禹都河南登封王城岗、启都河南新密新砦，以及安徽蚌埠涂山禹会村一带、大禹“会诸侯”、杀“防风氏”遗址的考古发现，为研究工作开阔了视野，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重要的资料来源。

本世纪遂公盨的出现，不但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得到证实，其“厥贵唯德，民好明德”之铭，使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关于“德治”的观念，至少在2900多年前的西周中期便流行于世，清楚地表明早中华民族传统的“德治”观早在大禹时期就已经产生并实施于国政之中，其意义之重大不言喻。

《史记札记》在探讨文献的基础上，本书重点引用最新考古资料，结合实地资料考察，采取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，在解答沉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有发明创新，颇具时代气息，且精义迭出，是为贡献。

徐日辉 记

2008年12月5日

# 目 录

一、太史公好“数” .....	1
二、《史记》五体.....	9
(一) 本纪十二.....	16
(二) 表十.....	22
(三) 书八.....	26
(四) 世家三十.....	39
(五) 列传七十.....	42
(六) 百三十篇.....	45
三、黄帝史迹多疑不清.....	49
(一) 维昔黄帝，法天则地.....	53
(二) 黄色之帝.....	55
(三) 黄帝生地.....	59
(四) 黄帝姬姓.....	64
(五) 轩辕之都.....	67
(六) 轩辕之时，神农氏世衰.....	81
(七) 风后、力牧、常先、大鸿以治民.....	86
(八) 嫘祖正妃.....	88
(九) 三鼎与九鼎.....	99
(十) 桥山与缙云.....	107



(十一) 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	116
<b>四、夏禹事迹言而有征</b>	<b>121</b>
(一) 禹生西羌北川	126
(二) 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不敢入	137
(三) 济、漯	148
(四) 禹城	154
(五) 禹凿龙门	158
(六) 夏禹姒姓	163
(七) 禹都阳城	168
(八) 禹会诸侯	178
(九) 百越	194
(十) 九州	202
2 (十一) 德流苗裔	214
<b>主要引用书目</b>	<b>225</b>
<b>后 记</b>	<b>251</b>



## 一、太史公好“数”
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曰：“罔罗天下放失旧闻，王迹所兴，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，论考之行事，略推三代，录秦汉，上记轩辕，下至于兹，着十二本纪，既科条之矣。并时异世，年差不明，作十表。礼乐损益，律历改易，兵权山川鬼神，天人之际，承敝通变，作八书。二十八宿环北辰，三十辐共一毂，运行无穷，辅拂股肱之臣配焉，忠信行道，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。扶义俶傥，不令已失时，立功名于天下，作七十列传。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，为太史公书”。

按：从“上古结绳而治”<sup>①</sup>，发展到今天的计算机，以及所谓的数字化等等，可以说我们世世代代就生活在数的世界中。  
但是，当我们把历史定格到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时期，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，通过上边的“十二，十，八，三十，七十，一百三十”这组特殊的数字，便可以清楚地反映出“数”在当时社会活动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。若深入其中，探究意义及内涵，却令人颇费周折。

数，生活当中实际存在的东西，在中国作为文化工具早在“三皇无文”之际<sup>②</sup>，就已经用于信息交流，以确定具体的量，史称“黄帝隶首作数”者即是<sup>③</sup>。考古发现在5000年前的黄帝时期就已经在使用二进制和十进制相结合的古量器<sup>④</sup>。科学史专家

① 《周易·系辞下》。

② 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。

③ 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注引《博物志》。

④ 赵建龙：《大地湾古量器及分配制度初探》，载《大地湾考古研究文集》，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。



们将中国数学的历史分为五期，其中第一期就是从黄帝到汉代<sup>①</sup>。数来源于生产生活的需要，因此，恩格斯说：“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，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：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，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”<sup>②</sup>。古老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度，因此数“在农业生产方面测量土地面积、推算仓库容积的经验”等多有应用<sup>③</sup>。在中国，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距今 8000 年前就已经有了存储粮食的窖藏<sup>④</sup>。

但是，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数字不仅仅是表示量，还有更为深刻的含义。例如，大家所熟知的大禹分九州之九州，铸九鼎之九鼎，不仅仅是土地的量和具体的数字，而是国家和主权的象征，九五之尊则成为皇帝的代名词。因此，从古到今中国人对数一直是非常重视。数同时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对数的认识“不仅仅关涉到数量、计算和测量，它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意蕴深广，扮演着多方面的重要角色，是显示民族文化心里的一个敞开的大窗口”；这是因为“在中国人看来，数是从现实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种属性和关系，而不是一种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的无法感觉和把握的实体，这是思维始终联系而不是摆脱实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的表现”<sup>⑤</sup>。但是，对于历史典籍中相关数的研究却是困难重重，尤其是对司马迁数思想的研究，就大不尽人意。黑格尔曾经说过：“柏拉图也述说了一些更

① 李俨、钱宝琮：《科学史全集》第三卷，第 1 页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。

② 恩格斯：《反杜林论》，载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三卷，第 77~78 页，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。

③ 李俨、钱宝琮：《科学史全集》第二卷，第 499 页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。

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、谢端琚主编：《师赵村与西山坪》第 230 页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版。

⑤ 吴慧颖：《中国数文化》第 422 页，岳麓书社 1995 年版。



详细的数的关系（但不是他们的意义）；直到今天为止，人们还不能从其中得出任何特别有意义的东西来。因此，数目的排列是容易的；但是深刻地说出其意义则是很难的，而且勉强去说出意义又始终是武断的”<sup>①</sup>。黑格尔的论述非常深刻，的确，我们在探讨司马迁与“数”的关系时就面临此类问题，有时还比较突出。毕竟司马迁距离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，我们今天很难还原到当时的情景，特别是社会风尚和流行思潮，而这些恰恰是我们今天研究司马迁思想最重要的元素。

汉初是我国黄老学说占主导地位的时代，作为国家的官方思想，黄老学说是第一次、也是惟一一次登上政治舞台，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几十年间盛行的黄老思潮成为社会潮流，而在其中尤以数最为突出。老子称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<sup>②</sup>，虽然讲的是哲学，却来源于天文表现于“数”。而“三生万物”表明数在人与自然中的作用非同一般。所以司马迁说：“数始于一，终于十，成于三；气始于冬至，周而复生”<sup>③</sup>。庞朴先生认为：“三与一之间，存在着某种神奇的关系”；“更抽象一步成为哲学”<sup>④</sup>。作为数，在司马迁时代还赋有相当重要的占卜功能。所谓“自古受命而王，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！其于周尤甚，及秦可见。代王之入，任于卜者。太卜之起，由汉兴而有。”<sup>⑤</sup>讲的正是以“数”为主的占卜，而且表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例如，有“汉之飞将军”之称的李广，就因为汉武帝认为是“数奇”<sup>⑥</sup>，故李广难封便成为命运不济的活教材，“数奇”

① 黑格尔：《哲学史讲演录》第一卷，第244页，商务印书馆1959年新1版。

② 高明：《帛书老子校注》，中华书局1996年版。

③ 《史记·律书》。

④ 庞朴：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·庞朴卷》第396~397页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。

⑤ 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。

⑥ 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。



则是命运。所以李广死后墓分两地，一处在今天河南省“安阳市西北 30 公里的磊口乡清峪村西头。冢呈馒头状，用黄土构筑，保存较完整。冢高 8 米，周约 35 米。原封土高大，上筑有庙”<sup>①</sup>。另外一处在甘肃省天水市区南郊文山山麓的石马坪，因墓前有两匹汉代石雕骏马故名。墓冢高约 3.3 米，周长约 26 米，墓前竖乾隆己未（公元 1775）年间立的“汉将军李广墓”石碑一座，又有一高约 6 米的纪念碑，中央有蒋中正题“汉将军李广之墓”七个大字。由于李广没有死在甘肃，所以他的家乡人就修建了这座“衣冠冢”作为永久的纪念。

班固批评司马迁是“论大道而先黄、老而后六经”<sup>②</sup>，真实地反映出司马迁属于“道家学派的学者”<sup>③</sup>。在黄老思潮的影响下，司马迁对“数”有着深刻的认识。他对“数”的认识来源于《易》八卦哲学与天文历法<sup>④</sup>，如“旋玑玉衡以齐七政，即天地二十八宿。十母，十二子”等<sup>⑤</sup>。十母，即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之十天干；十二子，即：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之十二地支。

正如美国学者保罗·韦斯、冯·O. 沃格特在《宗教与艺术》一书中所言：“我们有自己的习惯，而存在也有自己的某种活动规则。我们很快就了解自然的某种表象，了解了自然的活动方式，并且调整我们的活动和态度，从而使自己能够与自然和睦相处”<sup>⑥</sup>。

① 李久昌：《中原名人墓祠文化》第 214 页，三秦出版社 2004 年版。

② 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。

③ 卿希泰：《试论道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》，载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四辑。

④ 徐日辉：《史记八书题名新探》，载《西北师大学报》1996 年 4 期；《史记八书序列新论》，载《学术月刊》1996 年 10 期。

⑤ 《史记·律书》。

⑥ 保罗·韦斯 冯·O. 沃格特著，何其敏 金仲 译、丘仲辉 校：《宗教与艺术》第 23 页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。



此说很有道理。众所周知我们离不开生活的环境，同样也只能在所处的环境中求取最大的和谐。当我们在考察古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中，常常会发现一些传统的习惯在求知欲，包括意识形态和具体的行为流程等都带有明显的习惯表象，有些甚至非常突出和顽强。

司马迁好数在某种意义上讲，正是传统习惯的一种表象，体现在《史记》序目数列的“数”与“数”的有机组合上。《史记》全书的序目数列组合曾经有过改动，未成书前的《太史公书》序列为：“表十，本纪十二，书八章，世家三十，列传七十”<sup>①</sup>。改定后的今本《史记》序列为：本纪十二，表十，书八，世家三十，列传七十，凡一百三十篇。改动前后的对比表明，表十与本纪十二的互换看似简单，则意义大有不同。从数字上讲，十二为岁星运行一周天之数，岁星即木星，一周天即十二年，而且“地球上的自然气候亦随之产生 12 年周期的变化”<sup>②</sup>；一年分十二个月，故以天子为本纪统领全书，寓意昭然。《周礼》称：“冯相氏掌十有二岁，十有二月，十月二辰，十日，二十有八星之位，辨其叙事，以会天位。冬、夏致日，春、秋致月，以辨四时之叙”<sup>③</sup>。可见，表十作为历史的十月历对应十表，只是对本纪的补充而已。

思想家们认为：“历史是人和存在相互作用的产物。可以推测人和存在的某一部分之间先行的相互作用，导致建构起社会、国家或某种人类组织”<sup>④</sup>。考察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首先是对历史的认识，确定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，特别是对黄帝的表述，即在社会变革与国家建立的过程中，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体现出“人和存在的某一部分之间先行的相互作用”。司马迁通过“数”

<sup>①</sup> 《昭明文选》卷四十一。

<sup>②</sup> 王红旗：《生活中的神妙数字》第 265 页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3 年版。

<sup>③</sup> 《周礼·春官·冯相氏》。

<sup>④</sup> 保罗·韦斯 冯·O. 沃格特著，何其敏 金仲 译、丘仲辉 校：《宗教与艺术》第 26 页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。

的组合构建自己的著作体系，在一定程度上用以表达其内心世界，文化承传和哲学思想。通过对司马迁好“数”的研究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尽管司马迁是既能识史又能为史的第一人<sup>①</sup>，但他不可能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，更不是什么圣人，说到底也就是一位有思想的历史学家和文化人而已。所以司马迁在《史记》最后定稿时，所采用的篇目数或多或少接受了当时人们对数文化的认识，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必为此忌讳。因为这是他在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的状态下完成的“一家之言”。我们研究司马迁对“数”的认识，并不是对司马迁的贬低，而是更深层次地对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进行全面认识，把他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中考察，以便将《史记》研究引向深入。

中国人好数字、喜欢数字、更迷信数字，是因为数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确实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因子，其源远流长的数字崇拜一直影响到今天，例如，戏曲舞台上的将军身后都背着四杆旗，唯独河南豫剧中的程咬金身后却背着一杆旗。再如“十大青年”、“十大模范”、“十大模特”等等，是什么原因只评选十位，而不评选十一位、十三位、十七位呢？是没有那么多的人选，还是怕发不出纪念品？还有，今天单位开大会，会场主席台的背景基本上是十面旗帜，而不是七面或者十一面。面对这些社会现象，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我们自己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。

另外，第 29 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间选择的就是：2008 年 8 月 8 号晚 8 时。是不是逢 8 就吉利呢，未必见得，例如，1988 年 8 月 8 号 8 时，是千年等一回的好日子，所以，全中国选择这一天结婚办喜事的人特别多。然而，浙江省的杭州在这天却受到了七号台风的袭击。七号台风的风力在十二级左右，破坏力极大。强台风在杭州登陆后，以强劲的风力刮倒了西湖景区内大量的树

---

<sup>①</sup> 郑樵：《夹漈遗稿》卷二。



木，同时还造成杭州市的铁路、公路和市内公共交通完全中断，机场航班全部停航，停水停电时间长达 5 天之久，并有两人在这次台风中死亡。此次强台风灾害给杭州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10 亿元人民币。

尽管如此，人们对数字的迷信丝毫没有减弱，也不会因为一两次自然灾害就放弃迷信数字的做法。2007 年夏天我在闽南地区考察时，就发现当地的长途汽车站在非常显眼的地方写有布告：下月农历初三有发往 ×× 地方的班车，初六有发往 ×× 地方的班车等等，是因为当地人相信这天出门吉利。因此，傅道彬先生称“中国文化中深藏着一个由神秘数字构成的文化网络”<sup>①</sup>。杜勤先生也认为：“在古代中国，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数值体系往往对应于宇宙某个哲学命题。……因此正确地理解数的象征性文化内涵，将为把握古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发生、流变及其形态特征提供重要的依据”<sup>②</sup>。岂止是古代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，这些个神秘的数字曾几何时销声匿迹，而今却又成为了时尚。7

抛开神学，我们认为“数”作为人类高度文明的体现，是人类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产物。数的产生与运用使现象世界从无序走向有序，由混沌趋向明朗，难怪西方古典哲学家认为：数是万物的本源，并“具有一种特殊的神秘力量”<sup>③</sup>。他们还认为：没有数“人们就在一个黑暗的迷宫里劳而无功地游荡”<sup>④</sup>。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世界，数不再是仅仅局限于量与排序及组合等，尤其是高科技数字化的应用与完善，突出地体现着 21 世纪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。

① 傅道彬：《中国数理文化论略》，载《北方论丛》1989 年 5 期。

② 杜勤：《“三”的文化符号论》，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。

③ 《古希腊罗马哲学》第 34~38 页，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。

④ M·克莱因：《古今数学思想》第二册，第 33 页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 年版。



司马迁对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的构架是精心设计的，《史记》中特定的“数”，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哲学思潮的具体反映，就像今天人们常谈的“八”与“发”、“六”与“顺”一样，总要人为地组合一个被认为是吉祥或者是完美的“数”。作为时代的产物，在 21 世纪的今天，人类在遨游太空的同时尚且如此迷信数字，更何况是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了。

我的研究证明“司马氏世主天官”<sup>①</sup>，尤精于天文历法，而司马迁好之“十二”、“十”、“八”、“三十”、“七十”、“一百三十”之“数”都与天文历法息息相关，而“天学”在古代中国文化中“有着极为特殊的性质和地位”，是司马迁“一家之言”的重要构成<sup>②</sup>，所好“数”者，是来自于社会实践的深层思考，并非随意而定。因此，在我们今天的研究中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。

---

① 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。

② 江晓原：《天学真原》第 35 页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。



## 二、《史记》五体

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，分为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和列传五体。五体的功能各有不同，郑樵称：“本纪纪年，世家传代，表以正历，书以类事，传以著人。使百代而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，学者不能舍其书。六经之后，唯有此作。”<sup>①</sup>其“参酌古今，发凡起例，创为全史”<sup>②</sup>。

按：司马迁是古代中国包括东方世界在内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，他在《史记》中首创五体序列，成为两千年来纪传体史书之典范。但其用数“五”，体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。

五居数之中，且与人体相关，“在原始人心目中，五是与人的身体形态和生命奥秘息息相关的神奇之数”；正是由于“五既与人体的自然形态和生理活动有多种密切的关连”<sup>③</sup>，所以，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尚五之风。如：五行、五气、五星、五卜、五辰、五木、五中、五正、五臣、五民、五老、五车、五湖、五瑞、五章、五方、五刑、五量、五色、五官、五脏、五谷、五味、五辛、五菜、五金、五术、五音、五德、五伦等。对此，有专家认为：“数字五的神圣化却源于人类观念的演进及对客观事物的细心观察。首先，当人们分辨出东、南、西、北4个方向时，他们同时也产生了中间地带的观念，并用‘中’将分裂的四方联系起来并重新恢复其整体面貌。因此，数字五是一个胶合剂，它能使事物变

① 《通志·总序》。

② 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一。

③ 吴慧颖：《中国数文化》第38页，岳麓书社1995年版。



得和谐、统一”<sup>①</sup>。“于是古代特别是上古的军民组织，便多以五（五人五家）为基层最小单位管辖之数，往上各级组织的编制，也大多数是五倍五倍地由低到高级”<sup>②</sup>。尤其军队的编制，在周代就是五五制：“凡制军，万有两千五百人为军，王六军，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，军将皆命卿。二千五百人为师，师帅皆中大夫。五百人为旅，旅帅皆下大夫，百人为卒，卒长皆上士，二十五人为两，两司马皆中士。五人为伍，伍皆有长”<sup>③</sup>。作为孙子战争思想的最高境界——全胜战略，就是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，即：“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，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也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<sup>④</sup>。这里的军采取的正是五五制。

司马迁创立五体，就是深受当时社会上阴阳五行说的影响。所谓五行，指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种元素，是古老中国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。五行最早见于《尚书·洪范篇》。其文曰：

五行：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  
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革，土爰稼穡。  
润下作咸，炎上作苦，曲直作酸，从革作辛，稼穡作甘。

五行讲的是五种最基本的物质，是生产生活的总结；在西周时代，本意为构成世界万物的五种要素，并无迷信成分。因为五行各有属性，用眼睛看，则呈现出“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革，土曰稼穡”的客观现象；用鼻舌试，则有“润下作咸，炎上作苦，曲直作酸，从革作辛，稼穡作甘”的感受。

① 王红旗：《生活中的神妙数字》第 207 页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3 年版。

② 吴慧颖：《中国数文化》第 38 页，岳麓书社 1995 年版。

③ 《周礼·夏官·司马》

④ 《孙子兵法·谋攻篇》。